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0 冊

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

丁 威 仁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 / 丁威仁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4+316 面：17×24 公分（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三輯：第10冊）

ISBN 978-986-6831-87-4（精裝）

1. 明代詩 2. 詩學 3. 詩評

820.9106

97000380

ISBN - 978-986-6831-87-4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三輯 第 十 冊

ISBN：978-986-6831-87-4

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

作 者 丁威仁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第三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新學知
PDG

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研究

丁威仁 著

作者簡介

丁威仁，1974 年出生於基隆。東海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任新竹教育大學語文系專任助理教授，兼課外活動組組長。曾獲 2005 年第 27 屆、2007 年第 29 屆聯合報文學獎新詩組評審獎，九十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組首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等。學術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詩文理論與批評，魏晉與明代文學、台灣現代詩、現代文學、網路文學等。出版詩集《末日新世紀》（文史哲出版社）。個人網頁為：<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php/kylesmile/>

提 要

胡應麟《詩藪》云：「國初吳詩派昉于高季迪，越詩派昉于劉伯溫，閩詩派昉于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於孫賡，江右詩派昉于劉崧，五家才力，成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認為明初有吳、越、閩、嶺南、江右五個詩派，可見明初詩論之精采繁複。筆者也相當好奇明中、晚期關於復古與反復古的文學論戰，其中應有隱藏的潛在根源。假使仔細檢視這個根源，將發現解決明中晚期的許多文學爭端，就必須回到明初詩文理論的發展。明洪武、建文時期的浙東、江西與閩中詩學，確實影響明、中晚期的復古思維，連反復古、性靈與真性情的展現，也必須推至明初吳中蘇州等地的詩歌思維。整體但分向地討論明初詩歌思維的多元趨勢，替明中、晚期詩文理論的繁複景象，找出在明初地域詩學裡呈現的思維根源，正是本文命題研究的意義所在。本文藉元末明初文士詩學理論之完整閱讀，透過地域詩學的分向觀照，分析討論明初詩論的變遷與文化意義。明初的地域詩學便在這些文人的手上建立，我們將共時性（synchronic）的研究置入其中，透過不同地域詩人詩論的研究，方能彰顯出當時多元化的詩歌思維，與文化現況。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2
第三節 明初詩學研究概況	17
一、個別詩人之評述	20
二、文學理論的探討	24
三、元末明初詩文發展評述	28
第四節 研究論域與方法	32
第五節 本文架構	39
第六節 預期研究成果與限制	41
第二章 浙東派詩學理論	43
第一節 詩歌的基礎與根源論	50
一、「宇宙論」根源說	50
二、「五美之具」說	51
三、「三位一體」論與「詩三百」根源說	57
四、「四根源」、「誠源」與「仁源」說	62
五、「三層次」根源論	66
六、小 結	70
第二節 詩歌本質功能論	72
一、「一本貫通」論	72
二、「道本說」與「氣本說」	76
三、「誠本說」、「樂本說」與「乾坤清氣」論	81
四、「尚趣」、「尚智」與「尚志」說	87
五、「仁聲道本」說	91
六、小 結	96
第三節 詩歌創作方法論	98
一、「師古」工夫論	98
二、「才、學、識、體」與「思、學、養、變」工夫論	102
三、「自然平易」、「審音」與「虛靜」說	108
四、「開門覓句」與「心會於神」工夫論	112
五、小 結	115
第四節 詩歌批評論與詩史觀	117

一、「崇杜抑晚宋」的詩史思維	117
二、「無抑宋傾向」的詩史思維	122
三、「詩有十變」說	126
四、「莊周——李白——蘇軾」的詩史系譜與 「三設準」的詩歌批評	130
五、小 結	134
第三章 江西派詩學理論	137
第一節 詩歌的基礎與根源	143
一、「本經重道」與「思無邪」根源說	143
二、「詩三百」、「雅韻」與「返古」根源說	147
三、小 結	153
第二節 詩歌本質功能論	154
一、「明體適用」本質論	154
二、「詩道氣本」與劉崧「雅正和平」本質論	156
三、「神格」與「人格」的本質論分向	160
四、小 結	164
第三節 詩歌創作方法論	165
一、「默坐澄心」與「持志善身」工夫論	165
二、「廣識擬古」、「學古所自」與「學、養、 悟」工夫說	168
三、小 結	175
第四節 詩歌批評論與詩史觀	176
一、「一以貫之」、「二可法、二敝」與「俊逸」 的批評方法	176
二、「主情」說與「九期」詩史論	180
三、小 結	183
第四章 蘇州派詩學理論	185
第一節 詩歌的基礎與根源	192
一、「黃初晚唐」溯源說與「詩三百」宗教說 的對映	192
二、「自然」、「節制」與「三位一體」根源說	196
三、小 結	200
第二節 詩歌本質功能論	201
一、「神本論」與「性情爲本」的對照	201

二、「聲與元氣」二元本質論	204
三、「格、意、趣」本質說與「情本論」	207
四、小 結	211
第三節 詩歌創作方法論	213
一、「客窗三復」說	213
二、「求友」說與「朱子學」工夫論	214
三、「兼施眾長，隨事摹擬」與「成、達、存、養」說	217
四、小 結	221
第四節 詩歌批評論與詩史觀	222
一、「興寄」觀與「自然」判準說	222
二、「主情」說與「實用主義」批評論	225
三、小 結	227
第五章 閩中派詩學理論	229
第一節 詩歌的基礎與根源	232
一、「原於性命之正」與「詩三百」根源說	233
二、「以盛唐爲歸趨」與「從盛唐溯源漢代」	236
三、小 結	239
第二節 詩歌本質功能論	240
一、「詞、理、古」三本質說與「情真、氣古」二本質說	240
二、「三來」本質論	242
三、小 結	245
第三節 詩歌創作方法論	246
一、「符經」工夫論與「自然而發」說的對照	246
二、「師古」創作工夫論	248
三、小 結	251
第四節 詩歌批評與詩史觀	252
一、「李、杜」判準論與「詩爲文之一」說	252
二、「四變」詩史觀與「迴圈式」批評	255
三、小 結	259
第六章 其他地域詩學理論	261
第一節 河南宋訥之「詩樂合一」的「審音言志」說	261

第二節 安徽之唐桂芳、朱同	264
一、唐桂芳「格本」說	267
二、朱同「詩爲言之基礎」論	269
第三節 廣東孫蕡「企慕自然」之詩史觀	271
第四節 湖南劉如孫「盈天地皆心也」的本質論	273
第七章 四大地域詩學理論之交叉分析	277
第一節 詩歌的基礎與起源論	277
一、浙東派	277
二、蘇州派	278
三、江西派	279
四、閩中派	280
五、小 結	280
第二節 詩歌本質功能論	281
一、浙東派	281
二、蘇州派	282
三、江西派	283
四、閩中派	283
五、小 結	283
第三節 詩歌創作方法論	284
一、浙東派	284
二、蘇州派	285
三、江西派	286
四、閩中派	286
五、小 結	287
第四節 詩史觀與詩歌批評論	288
一、浙東派	288
二、蘇州派	289
三、江西派	289
四、閩中派	289
五、小 結	290
第八章 結 論	293
參考書目與文獻資料	30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傳統文學史的角度觀察詩文發展，到了明代，古文創作經過漢、魏至唐宋之古文運動，已臻成熟；而古典詩歌從古體詩、樂府詩經過唐代近體詩，與宋人將詩境推至「尚理」的表現，也粲然大備。因此，傳統文學史的觀念，認為明代詩文無法開新，只能復古。但為何要研究明代詩文？許師建崑從普及教育與科舉考試的發展、出版書籍數量與傳播的廣度，以及文學類型多元發展三個角度，探討明代「文學大眾化」的現象；並以詩社、文社與講學活動的興起，人民識字率的提高，分析明代「大眾文學化」的狀態〔註1〕。就此兩個面向切入，將發現明代詩文之地位實勝於其餘文類，明代詩文之貢獻並不在於文類新的發展，而是文學批評理論之完整建構與發明，以及詩文轉向於大眾的參與。

元代馬上治國，建都北京，文人的地位下降，有部分的知識份子轉入民間場域，尋求發聲的可能，使元代的文化主軸有俗化傾向。朱

〔註1〕 許師建崑〈文學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化——重構明代文學史論述的主軸〉，南華大學文學系編《明清文學與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5月1日舉辦，頁332～345。

元璋建國後，為恢復漢唐衣冠，鞏固政權結構，便藉由朱子學作為文化思維的骨架，引入理學系統，透過浙東與江西文士的輔助，導政權的文化進路於道德正軌。其中浙東文人專精永嘉之學，亦是朱元璋早期攻伐各地時謀士的來源，而江西以朱子性理之學為宗，自宋代以來便是江西詩派與理學家的薈萃地，這兩個地域的文化理所當然成為鞏固政權的來源，加以閩地原是河洛餘裔，亦為朱子的出生地，閩刻之興盛繁榮反映閩地的經濟狀態有長足發展〔註2〕，閩文化在明初時期得到相對的重視，如「閩中十子」亦參與朱氏政權在文化架構的編書活動。我們可以說浙東、江西與閩中三個場域，以朱子學共構了明初時期的文化思維。吉川幸次郎說：

明詩的發展，大致上，也是照著簡易率直的方向，而且更多的民間詩人，加入了創作的活動。……這種趨勢在明初的詩壇已很明顯。當時比較出色的詩人多半在南方，特別是以蘇州為中心的地帶。不過這些詩人專以文學為能事——至少朱元璋認為如此，卻招來極大的不幸。〔註3〕

元末明初文士論談詩文，彼此間的詩文酬酢相當頻繁，尤其在東南之地的蘇州，情況為著〔註4〕。烽火連天的元末明初社會，東南一地不

〔註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華書局1964年版）卷四〈經籍會通〉載：「凡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其實，自宋代以來，建陽坊刻可謂獨冠全國，入明以後，持續發展，進入更為繁榮的時期。關於福建刻書之發展，詳見謝水順等著《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6。

〔註3〕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台灣國立編譯館主編，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1986年，頁141。

〔註4〕《明詩紀事》甲籤三卷至三十卷共收洪武朝詩人三百七十五人，乙籤一至二卷收建文朝詩人二十六人，共收錄四百零一人。其中籍貫大多屬於南方，以蘇州詩人為最，共收一百三十餘人；其次是浙東詩人，共收八十餘人；江西則收五十五人，閩中共四十人；而北方一地居然只有六人。陳田《明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甯給予知識份子避難而居的場域。張士誠據吳期間，元末文人集中此地。瞿佑云：「張氏具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註5〕；文徵明亦云：「僞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悉萃於吳。」〔註6〕可見蘇州經濟發達，社會對於戰亂的承受度較高，也產生了豐富多采的詩學思維與詩學理論。然而朱元璋平吳後，對吳地採取一連串遷戶限商的政策，使吳地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也隱含對吳文化的壓抑與控制。建國後，他與浙東共構的文化政策，在道學思維的引領下，與吳地較為自由的文化風氣大異其趣，反而使吳地的文藝成為隱伏且不和諧的音符。

其實，元末群雄割據，北方的文化相對薄弱，南方地域文化，在動亂中自然呈現。這批文人裡與朱元璋想法最接近也較早成為入幕之賓的文士，幾乎都是至正十八年（1358）攻下婺州之後，被任用的浙東人士，浙東派便成為一個掌握文化權力的流派。「明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淮西武力集團與浙東文人集團相結合的產物」〔註7〕，這樣的思考可為確論。到底明洪武、建文時期「地域詩學」的概念是否成立？以下列出幾個相關的原典後進一步討論：

- （1）國初吳詩派昉于高季迪，越詩派昉于劉伯溫，閩詩派昉于林子羽，嶺南詩派昉于孫蕢，江右詩派昉于劉崧，五家才力，成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註8〕
- （2）我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為極盛。〔註9〕
- （3）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於弘、正，極於嘉、隆，衰於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於明初，若黎眉（劉基）、海叟（袁凱）、

〔註5〕《歸田詩話》卷下。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6〕文徵明《跋文姬權厝志》，四庫全書《甫田集》卷二十一。台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註7〕引自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上）》，台北：文津出版社，頁51。

〔註8〕明·胡應麟《詩薮》卷一，台北：廣文書局印行，1973年。

〔註9〕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255。

子高（劉崧）、翠屏（張以寧）、朝宗（汪廣洋）、一山（李延興）、吳四傑、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唐肅、謝肅）、崇安二藍（藍仁、藍智），以及草閣（李曄）、南村（陶宗儀）、子英（袁華）、子宜（張適）、虛白（胡奎）、子憲（劉紹）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註10〕

- （4）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尤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

〔註11〕

從上述引文，可以做如下的觀察：

- （1）胡應麟認為明初應用地域的角度觀察詩學發展，他將之區分成吳、越、閩、嶺南、江右五個區域詩學。
- （2）葉盛亦以地域方法觀察明初詩學，認為有三大派系：閩、浙、吳中。
- （3）陳田除了舉出重要詩人外，也以地域的觀察提出幾個重要流派：吳四傑、粵五子、閩十子、會稽二肅（唐肅、謝肅）、崇安二藍（藍仁、藍智）。
- （4）沈德潛雖然只提出三人，實際上包含浙（越）、吳、閩三系。

從以上所述，可先歸納出明初的詩派有：浙（越）、吳、粵（南園五子）、閩、嶺南、會稽二肅、崇安二藍等等。以此思維重新檢視，將發現我們對於明初詩學的理解，不甚全面，往往從北方學術的角度展開討論，忽略了元末明初是以南方為主之地域詩學的時代，並影響整個明代的詩學發展。以下我們整理《明詩紀事》裡所收洪、建朝詩人的地域分部，更能確證明初詩學是地域詩學。

《明初紀事》甲籤三卷至三十卷收洪武一朝詩人三百七十五人，乙籤一至二卷收建文朝詩人共二十六人，共錄洪、建二朝四百零一人，其中籍貫北方的詩人只有李延興、張昌、張紳、朱諒等五、六人

〔註10〕 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序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註11〕 沈德潛《明詩別裁·序》，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

而已：

浙 東（越）	八十餘人	約百分之二十
蘇 州（吳）	一百三十餘人	約百分之三十三
江 西（江右）	五十五人	約百分之十二點三
閩 中（閩）	四十人	約百分之十

從上表可見，明初地域詩學集中在籍貫南方者，其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北方中央政府裡的官僚或進入臺閣重地，這四個流派的确是影響明初時期詩歌創作與理論思維的重要部分，本文將以各種論證，討論明初地域詩學之成立，及詩學理論之內涵與異同，藉此重新思考明初詩學理論的本質與可能的影響。

假使進一步思考明初的「地域詩學」，或將提出諸多問題：

- （一）中州文人的組成為何？
- （二）北人治經、南人文學是否符合明初文化的概念？
- （三）北方的文學弱於南方嗎？地域詩學的概念強調南方文學優於北方嗎？
- （四）假使中州學風流動更替，南人入北後，文學型態又該如何？

以元末明初的地域詩學來解決這些疑問，會相當清楚。首先，浙江與江西本為明代文學與程朱理學之重鎮，朱元璋早期建國時任用之主要文士，多為浙東一地，可見中州文人的組成，在明初以至於整個明代，多由南方文士透過科舉入北取得，而科舉所考的是程朱系統的理學思維，因此北方的學術系統，大部分由南人與中央政權共構，朱子學為核心，浙東派與江西派的文士為根本，他們的詩學理論，也充分反映這樣的事實。換句話說，明初的詩學與文化，無法武斷地以南北分割的方式觀察，反而是共時性之地域詩學組構的，浙東與江西文士先後成為重要官僚，取得並延續其文化權力；蘇州文士因無法躋身權力核心，加上元末以來的自由風氣仍存，縱使在朱元璋刻意壓抑

下，仍呈現一種像是抗拒主流的逆向音調，研究地域詩學便能呈現明初文化權力的消長與更迭。

第二，剛已論及明初北方官僚集團的構成，是由浙東文士推展文化的流行，除了因為浙東延承元代朱子學的緣故，更是為了配合朱元璋一系列的文化政策，朱元璋云〔註12〕：

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於斯教。
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
得其至精。苟非其類，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註13〕。

他將社會重要的職業，均推之儒教根源，就是承認儒教是社會結構的根本，而其內涵是文學與道統，政治上可輔佐君主治國，以下幾段引文分別討論朱元璋思維裡的文學與道統：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秋變冬，此四時之化。〔註14〕

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宜而為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為之，輕則致殃，重則喪命。〔註15〕

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于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家洪休，文廟祀焉。〔註16〕

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皋陶、周、呂、召，為教臣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眾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為君者享國且短，為臣者不匡為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註17〕

〔註12〕關於此後朱元璋之引文，均引自胡士萇點校之《明太祖集》，黃山書社出版（安徽古籍叢書系列），此但標頁數，不再註引出處。

〔註13〕朱元璋〈拔儒僧文〉，頁265。

〔註14〕〈保身說〉，頁320。

〔註15〕同前註，頁321。

〔註16〕〈釋道論〉，頁213。

〔註17〕〈問聖學〉，頁198～199。

因如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

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註18）

他相當肯定儒者的作用，治國的基本綱領必須是儒術，儒術的概念繼承董仲舒以降「天人相應」、「三綱五常」的漢儒思考，朱子學似乎只是他就近取捨的方便進路，「氣化宇宙論」才是朱元璋秉以治國的重要方法。這種觀點之下，禮義綱常的規範性會高過自覺反省的內在性，自覺心性的開發，並非朱元璋所強調，「認知系統」的治國方式才成爲他的導向。於是，文學的觀念不該流於繁文，也不應以過大的篇幅辨析「自覺心性」，文章創作只存在「功用論」與「目的論」，強調其功能內涵與事態本質，形式的要求亦被視爲浪費生命之事。而洪武初、中期當朝的浙東詩人與江西詩人，也承繼朱子理學，藉此與朱元璋配合，形成文化的官僚結構。因此，北人治經與南人文學不應視爲割裂，從地域詩學的角度分析，明初朝廷的文學推展根本是浙東詩人與朱元璋的觀念所共構的。

第三，地域詩學的考量必須回到元末的割據狀態，此時期不應以南北分立這種武斷的角度思考，元末的社會情況與朱元璋攻拔各地，才是重要的觀察點。徐子方以「裂變」的概念形容此時的社會文化狀態：

更爲重要的事，元王朝已無法繼續維持其統治，種族特權與民族歧視激化了社會矛盾，如火如荼的紅巾軍大起義迅速動搖了蒙古統治者的社會根基，以朱元璋爲首的漢族統治集團在元末社會大動亂中崛起，預示著一個新王朝的誕生。時隔不到一個世紀，剛剛形成不久的元代文人群體，再一次面臨著嚴峻的人生選擇，而這種選擇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群體的最終分裂。由於不同於此前一朝代社會內部的分化組合，面臨這次分裂，文人群體的心態轉移也呈現著全新的趨勢。（註19）

〔註18〕 〈建言格式序〉，頁305。

〔註19〕 徐子方《挑戰與抉擇——元代文人心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他用「群體裂變」稱呼元末的文化社會狀態，頗為恰當。北方蒙古政權呈現的內耗，使元末的蒙古種族與色目人中，守節盡禮的少數文士儒生，在即將分崩離析的風雨中，憂心如焚，如余闕、秦不華、乃賢、丁鶴年等知識分子，都提出過對於蒙古統治者的規勸與建議；南方的戴良、王逢、甚至於拒絕朱元璋任用的楊維禎，也以元末遺老的想法，形于歌詩。這可以發現元延祐以後，重行漢法，恢復儒治的結果，但這群文人終究是元末的少數，就南北而言，北方朝廷擁有的文士是蒙古、色目被漢化的文臣，南方擁立元朝的漢族文人，在群體裂變下，有的如戴良等人忠於名節；有的則如王冕、徐舫、何景福等人逃離現實、憤世自避；或是一群如黃公望般歸隱山林，不問世事的畫家。這些人並非是開創群體裂變，與地域文學的領導人物，反而呈現北方文化之薄弱，與南方文化之消極。但元末的文學狀況應如辛一江所言的相當活躍：

元末明初的文學思想是相當活躍的，尤以東南為著。東南地區從南宋開始就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元末戰亂，東南相對穩定，成為文人的避難之地，加上割據東南的張士誠輩附庸風雅，各種文學社團也應運而生。（註20）

元代長期對文人，尤其是漢族南方文人的壓抑，反而使他們在民間透過結社，或相互唱和，形成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在政權分崩離析，豪傑蜂擁並起的元末時期，成為割據勢力所聘用的對象，讓「群體裂變」的現象發生，地域詩學便從元末延續到明代初期：

真正體現元代文人群體大裂變實質的是在元明易代過程中起著積極促進作用的宋濂和劉基等人。……在他們身上，體現著元代後期文人價值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還須指出的是，元末新舊交替也不僅僅表現於元明兩個王朝之間，促成元王朝滅亡的還包括和明太祖朱元璋一道揭竿而

249，2001年11月。

〔註20〕辛一江〈論元末明初越派與吳派的文學思想〉，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二十一卷第三期，1999年9月。